

東方與西方：信任與否？¹

亞洲能夠重返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心，部分可以歸因於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智慧和思想。但要遏制東西方日益加劇的不信任，西方現在必須向中國的亞洲鄰國學習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這是至關重要的。

當前，人類正處在歷史上最重要的十字路口之一。西方主導世界的短暫時代即將終結，這一趨勢勢不可擋，東方和西方需要找到一種新的平衡。擺在眼前的是兩條截然不同的路：走向統一或走向分歧。

理論上，東西方之間應該會走向分歧，對許多亞洲國家和文明來說，西方統治的烙印仍在。在鼎盛時期，西方踐踏了伊斯蘭世界，不費吹灰之力地殖民了印度、羞辱了中國。一旦被壓迫的社會恢復了文明力量與活力，隨之而來的就是向西方復仇的願望。正如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經做出的著名預言：世界將會經歷一場文明的衝突。

¹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Jan 19, 2020.

但事實恰恰相反。由於西方認知的廣泛流行，尤其是西方思維帶來的影響，東西方年輕人的夢想與抱負產生了根本性的趨同。正如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我在 2016 年合寫的文章《文明的融合》（*The Fusion of Civilizations*）中所說：“世界上大多數人現在都懷抱著與西方中產階級相同的願望：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找一份好工作，在一個穩定、平和的環境裏過著幸福又充實的生活。西方不應感到沮喪，而應慶祝它成功地將自己世界觀的主旨注入其他偉大的文明。”

幾年後，尤瓦爾·諾亞·赫拉利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從現代人身上觀察到，幾乎所有人都處於相同的地緣政治、經濟、法律和科學體系之中。正如他所言：“如今，當伊朗和美國之間劍拔弩張時，兩者都會談到民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國際權利和核物理。” 伊朗外長穆罕默德·賈威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就是一個極其鮮活的例子，可以證明伊朗和美國或許存在心理上的趨同。扎里夫對西方歷史和文化的深刻了解與理解超過了西方許多著名人士。

西方思維的傳播以及全球在法治等規範上的趨同，造就了中國、印度尼西亞、印度和阿聯酋等國家對政府和經濟的高度信任，這種信任程度遠高於在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等許多西方國家。

在世界上競爭最激烈的“人類實驗室”裏，東西方思想的融合創造出神奇的效果。當年輕的企業家蜂擁到矽谷尋找下一家初創企業時，當年輕的新生進入最優秀的常春藤聯盟大學時，他們的意識中沒有東方和西方的差別。相反，他們都胸懷抱負，跨文化合作毫無障

礙，力求取得卓越成就。同樣，當中國的大學校長們努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時，他們也深知必須效仿美國和歐洲大學的最佳做法。簡言之，多股力量都正在推動世界 75 億人口走向更深的融合，所有這些自然會促成東西方的互信。

然而，推動人類走向分歧的力量同樣強大，其中一個已經形成了破壞性的力量：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較量，將是一場經濟與政治、軍事與文化領域的多層面競爭。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基倫·斯金納（Kiron Skinner）敏銳地觀察到，這將是美國與“非白人大國”之間的第一次鬥爭。她指出了會導致中美之間不信任的一個關鍵因素。

科技推動了人類對自然界的認知，建立起跨文化交流的橋樑，但缺乏互信也讓科技致使人類世界產生分裂。如果一家德國或法國（乃至日本或印度）的電信公司成為 5G 技術開發的領頭羊，美國會默然接受。然而，當中國的華為公司成為技術領先者，美國遲疑了，決定採取打壓措施。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早就指出：“無論理由多麼正當，這一舉動都無異於中國排擠了蘋果和微軟。這是一場發生在中國科技領域的地震……許多中國科技公司現今都在考慮：我們再也不會讓自己陷入關鍵部件完全依賴美國的境地，是時候加倍努力地自己製造了。”

對華為公司的打壓只是冰山一角。美國將重拳出擊，使自己與中國的技術“脫鉤”，希望藉此能阻礙中國的發展。確實存在這種可能性，但以此為賭注實為不智之舉。亞洲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敏銳

地觀察到，中華文明是唯一一個歷經四次衰落，但每次又重新崛起的主要文明。現在，中華文明剛剛開始恢復活力，中國的重新崛起勢不可當。

在不費一槍一炮就擊敗了強大的蘇聯後，美國的戰略規劃者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會在中美地緣政治競爭中再次獲勝。這種可能性當然有，但 2020 年的世界與冷戰伊始時的 1950 年已截然不同了。在世界各地，強大和自信的國家和地區正在興起。居住在美國和中國之外的 60 億人不會輕易地受到脅迫去站隊，他們將會做出自己的選擇。

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和西方完全可以從中國的亞洲鄰國學到一些寶貴的經驗。與西方一樣，許多亞洲鄰國也對中國的崛起懷有擔憂。然而，作為與中國毗鄰了數千年的國家，它們深知阻止中國崛起將勞而無獲。相反，每個鄰國，包括印度、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大國及中等國家，都會做出務實的調整：必要時反擊中國，互利時相互合作。

21 世紀正穩步向多元文明的世界演進，西方完全可以多多少少學會一些靈活的亞洲思維方式。西方不是必須以非黑即白的眼光來看待世界，在信任與否之間二選一，而是可以學會與成功的非西方社會共存——它們與西方既有相似又有不同。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某些方面與西方相通，但同時又保留著自己獨特的文明形象。這對西方社會來說，也許是在信任領域的最大考驗：他們能“信任”那些永遠不可能完全西方化的國家和地區嗎？

亞洲世紀的曙光¹

近期的大流行病突顯出了東亞社會的優勢與西方社會的劣勢。西方在應對疫情上表現不力，這將加速權力向東方轉移，昭示著亞洲世紀的黎明即將到來。

歷史轉了一個彎。西方統治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亞洲在世界事務和全球經濟中已經開始恢復過去的榮光，這一趨勢將在危機後的新世界秩序中得到鞏固。對西方國家的順從，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是常態，但現在對東亞國家日益增長的尊重和欽佩將取代這種常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標誌著亞洲世紀的開始。

面對疫情，東亞各國政府（尤其是中國、韓國和新加坡）採取了有力的應對措施，而西方國家政府（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和美國）則表現得頗為不力，這場危機突顯了東西方在應對疫情時的反差。東亞國家的死亡率要低得多，這一點值得各國學習。東亞各國

¹ *The Economist*, April 20, 2020.

的有力應對不僅反映了其良好的醫療能力，也反映了其優秀的治理水平與文化自信。

一些西方國家政府不願意依靠科學和基礎流行病學模型來決定應對政策，這令許多亞洲人感到錯愕。在武漢經歷了最初的失誤（顯然是災難性的）之後，中國堅定地採取科學措施，制定了強有力的公共政策來全力應對這一場危機。在中國科學家完成了對病毒基因組的測序後，中國政府於 2020 年 1 月 12 日公佈了基因數據，這是相當負責任的行為。

如果在半個世紀以前暴發一場類似的全球疫情，西方國家會處理得很好，東亞的發展中國家則將會遭受磨難。但如今，東亞的治理水平為全球確立了標準。中國的鄧小平和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領導人扭轉了各自國家的局勢，在社會中播下了知識、國際主義和秩序的種子。這些種子已經發展成對科技的尊重、實用主義文化、向世界學習最佳實踐的意願，以及追趕西方的願望，同時還伴隨著對教育、醫療保健和環境等關鍵公共產品的大量投資。

因此，在後疫情時代，其他國家將會視東亞地區為榜樣，不僅要向東亞國家學習如何應對流行病，還要學習如何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1981 年，羅納德·里根在就職演說中宣稱“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才是問題所在”，自此以後，美國的公共服務機構逐漸失去了權威性，並因此導致士氣低落。所以說，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並非始作俑者，他只是導致事態惡化了而已。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是全球最受尊敬的機構之一，即便如此，在新冠

肺炎疫情暴發後，特朗普仍然提議削減該疾控中心的預算。全世界為之嘩然。

相比之下，東亞社會則相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睿智見解：一個社會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自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和良好的治理能力這隻“看得見的手”共同發揮作用。可以說，中國的精英政府目前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後疫情時代，我們將看到中國為了公眾利益而加速發展，中國對強勁的市場手段和良好的治理能力的平衡將強烈地吸引其他國家效仿。

中國的封建社會綿延了數千年，在這樣的社會形態中，絕大多數底層民眾毫無機會展現自身的智慧。鑒於在 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中期的“屈辱世紀”中所遭受的苦難，中國深知一個軟弱的政府會給國家帶來何種危險。中國人在心理上比其他任何勢力都更害怕混亂，所以中國人民渴望國家強大。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力應對增強了中國民眾對領導人的信任。

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顯然與韓國、日本、中國台灣和新加坡的社會制度有著巨大的差異，但同時，它們也有一個共同點，即對由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組成的強有力的政府機構充滿了信任。對精英管理制度的重視也深深地植根於儒家文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門檻很高：只有優秀的畢業生才能夠加入。同樣重要的是，文化自信的提高推動了治理水平的提升，而治理水平的提升反過來又增強了文化自信，二者相輔相成。這些逐漸打破了亞洲對西方的順從，而在過去，這種順從被視作理所當然。

總之，東亞的能力和自信將重塑世界秩序，並且這一趨勢已經開始了。20 年前，沒有一個中國人在任何聯合國組織裏擔任主要負責人。但如今，糧農組織（FAO）、國際電信聯盟（ITU）、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四個聯合國組織的秘書長一職皆由中國人擔任。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仍然固守著西方的勢力，堅持只有歐洲人和美國人才可能擔任總裁或行長，它們就會逐漸喪失信譽，除非這兩個組織允許亞洲人（以及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來管理。不能適應變化會給所有個體都帶來傷害，國際組織也不例外。

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是二戰後西方國家對世界的饋贈。當中國成為世所公認的經濟強國時，它會徹底推翻這一秩序嗎？好消息是，作為目前這一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將會保留這些規則。但中國也將試圖系統性地削弱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在 2020 年初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選舉中，中國推薦了一名中國籍的候選人，但卻遭到了美國的強烈反對。最終，一位來自新加坡的候選人獲勝。這預示著中美之間將有更激烈的競爭。

就連歐洲人也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不再抱有幻想。特朗普政府沒有事先通知就發佈了從歐洲到美國的旅行禁令，而在同一個星期，中國政府卻向意大利和西班牙輸送了包括口罩、呼吸機、防護服等醫療設備以及醫生，我相信這些大家都不會忘記。也正因如此，七國集團在 2020 年 3 月召開視頻會議後，頂住了美國的壓力，沒有在公報

中使用“武漢病毒”來描述新冠肺炎疫情。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世界各國會樂於接受一套完全由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如我在新書《中國的選擇》中所寫，各國不想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中國的崛起仍將引起各國——尤其是鄰國——的擔憂，畢竟，不管大象有多溫和，都沒有人會願意和牠擠在一個小房間裏。

大多數人都希望美國能夠繼續發揮作用以平衡中國的影響力。然而，他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既有能力又謹慎行事的美國，而不是一個迫使他們在兩種制度之間做出選擇的美國——但事實上，美國似乎只給出“支持我們或反對我們”這一個選擇。

為了維持自身的角色和尊嚴，美國必須施展非凡的外交手腕。然而，美國的外交部門從未像如今這般士氣低落，中國的外交部門卻從未像如今這般信心滿滿。好在美國並沒有以一敗塗地。例如，由於美國參與東南亞事務已有多年，因此該地區的一些國家對美國仍懷有善意，對此，美國的外交官們可以善加利用。

隨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所佔的分量越來越重，它將不得不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美國已經逐漸脫離聯合國大家庭，中國非但沒有，還迸發出承擔起更多責任的信心。例如，在疫情爆發前，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被一些西方成員國所削弱，20 世紀 70 年代起，一些西方成員國就已經開始削減會員國的義務性會費比例，這導致世衛組織的大部分預算依靠自願捐款。如今，世衛組織約 80% 的預算來自自願捐款，由於其只能依靠可預測的收入即義務性會費來開展長期能力建設，中國

可以呼籲將義務性會費恢復到早前佔預算 60% 左右的水平，這也能彰顯中國的全球領導力。

這也許只是一個開始。危機過後，西方可能步履維艱，中國則更加果敢。我們可以期待中國展示自身的實力。矛盾的是，由中國領導的世界秩序可能會變得更加“民主”，因為中國並不想向世界輸出自己的模式，而是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裏與各國實現多元性共存。西方或世界其他國家不必為即將到來的亞洲世紀而感到不安。

